

# 「出而不戰」： 中國出兵朝鮮決策重探

• 金東吉

**摘要：**本文基於新解密的中俄兩國文獻、檔案以及筆者的訪談資料，重新審查了朝鮮戰爭研究中以下三個問題：一、朝鮮戰爭爆發對中國國內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二、毛澤東早在1950年7至8月便希望出兵朝鮮以及斯大林反對中國盡早出兵的原因；三、10月13日，毛澤東推翻前一天的不出兵決定，並最終決定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和武器援助的情況下出兵朝鮮的原因。本文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認為：第一，美軍越過三八線，並不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前提；第二，中國決定出兵的關鍵原因在於，如果中國出兵朝鮮，美韓軍隊可能就地停止前進，中國可以在不與美國打仗的情況下，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朝鮮北部。中國出兵朝鮮是出於實際利益的考慮，即以最低成本獲取最大利益。

**關鍵詞：**朝鮮戰爭 出兵動機 毛澤東 斯大林 金日成

## 一 緒論

1950年6月25日爆發的朝鮮戰爭，不僅將美蘇冷戰擴大到全世界範圍，而且還引發了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持續兩年零九個月的未宣戰的全面軍事衝突，並導致兩國長期處於敵對狀態。1951年2月，聯合國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侵略者，中國此後長期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與此相對，1950年10月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與美國作戰，極大地提高了斯大林對毛澤東的信任，進而奠定了中蘇蜜月關係的基石。從這一意義上說，朝鮮戰爭直接塑造了1950至60年代的國際秩序。因此，中國出兵朝鮮的原因，一直是學者研究的重要主題。

\* 基金項目：韓國教育部韓國學研究「重點大學」計劃——「關於近現代中韓關係世界高水平研究教育體系的構建」(AKS-2021-OLU-2250005)。

1980年代以前有關中國出兵朝鮮的研究，隨着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治、思想環境的變化及相關檔案文獻的公開而發展。1950年代，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出兵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以擴大共產主義為目的，這一觀點被稱為「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①。1960年，懷廷(Allen S. Whiting)基於西方情報、中國報刊以及北京電台廣播資料，認為中國出兵朝鮮是礙於外部安全威脅而迫不得已的行為，該說後被稱為「安全威脅論」②。在1960至80年代，西方學者普遍接受並進一步發展了懷廷的觀點，主張美軍跨過北緯三十八度線(三八線)導致中國出兵朝鮮。如果美軍沒有越過三八線，中國便不會出兵，朝鮮戰爭在1950年秋天就會結束③。

自1980年代初以來，隨着中國檔案及相關回憶錄的逐步公開，中國和留美華裔學者開始主張，早在朝鮮戰爭爆發初期，毛澤東就積極希望出兵。姚旭主張，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很快下令派遣海陸空軍大舉侵入朝鮮，並派遣第七艦隊公開奪取台灣，使毛澤東確信「我們和美國較量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就看是選擇甚麼地方」④。華裔學者陳兼斷定前人的研究落入了「衝擊—回應」模式和「美國中心觀」之窠臼，主張「中共的革命民族主義、在亞洲或世界範圍內革命的責任感以及保持中國革命的內在動力」是決定北京外交政策和安全戰略的三個基本依據。陳兼注意到，儘管斯大林在1950年10月11日拒絕立即向中國人民志願軍(志願軍)提供空中掩護，毛澤東仍堅持出兵，甚至說服自請卸任志願軍總司令的彭德懷不要辭職。毛澤東相信，「朝鮮的命運，與中國的安全利益和東方乃至世界革命的命運息息相關」⑤。沈志華提出，「美國宣布台灣地位未定，並派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激發了毛澤東的「革命熱情和好鬥精神」，從此「在毛澤東心目中，與美國之間的戰爭已經開始」⑥。他還認為，在1950年10月14日斯大林通知中國，蘇聯空軍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作戰的情況下，毛澤東仍然強調「就算打不過美國也要打」，是為了獲得蘇聯對中國未來安全的保障和經濟援助⑦。陳兼和沈志華的說法可被稱為「亞洲和世界革命論」或「亞洲革命義務論」。

然而，這些強調毛澤東出兵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研究，不能合理地解釋以下事實：第一，1950年10月2日晚，毛澤東通知斯大林和金日成，中國將不出兵朝鮮；第二，8日，周恩來帶着與蘇聯援助掛鈎的出兵和不出兵兩套方案向黑海出發會見斯大林；第三，11日，周恩來在與斯大林的會談中，當場決定中國不出兵朝鮮。次日，毛澤東也兩次向斯大林通報了中國將不會出兵的決定。

基於新解密的中俄兩國文獻、檔案以及筆者的訪談資料，本文重新審查了以下問題：一、朝鮮戰爭爆發對中國國內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二、毛澤東早在1950年7至8月便希望出兵朝鮮的原因；三、10月13日，毛澤東推翻前一天的不出兵決定，並最終決定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和武器援助的情況下出兵朝鮮的原因。本文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認為：第一，美軍越過三八線，並不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前提；第二，中國決定出兵的關鍵原因在於，如果中國出兵朝鮮，美韓軍隊可能就地停止前進，中國可以在不與美國打仗的情況下，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朝鮮北部。

## 二 毛澤東從希望盡快出兵轉為謹慎保守

朝鮮戰爭爆發之前，金日成認為美國不會干預。他在1950年4月與斯大林的會談中分析稱，「因為美國人知道蘇聯與中國站在朝鮮背後，會幫助朝鮮，美國人不會冒險進行大規模戰爭」<sup>⑧</sup>。但是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卻迅速介入。美國國務院將朝鮮的進攻視為「由蘇聯策劃並實施的一次行動」，杜魯門也認為「如果允許韓國陷落，那麼受到鼓舞的共產主義者將會繼續蹂躪其他自由國家」，並主張「自由世界應當以強硬的反對立場迎戰朝鮮的進攻」<sup>⑨</sup>。6月27日，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天，在美國主導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一項決議，建議「聯合國成員國向大韓民國提供必要的援助，擊退武裝進攻，恢復該地區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同時，美國政府批准美國海空軍在三八線以南地區採取軍事行動<sup>⑩</sup>。同一天，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派遣「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並稱「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本問題的和平解決或聯合國的審議」<sup>⑪</sup>。

中國譴責美國的行動為「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sup>⑫</sup>。由此，中美關係迅速緊張。6月30日，美國政府將其海空軍作戰範圍擴大到整個朝鮮北部地區。7月1日，美國第一支地面武裝部隊、由史密斯(Oliver P. Smith)率領的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到達釜山，並於5日在烏山與朝鮮人民軍(人民軍)進行了首次戰鬥<sup>⑬</sup>。7日，以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聯軍)正式組建，由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任總司令，自此美國全面參與朝鮮戰爭。

在美軍地面部隊抵達釜山的同時，中國就明確了出兵朝鮮的條件。7月2日，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向斯大林通報，「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組成穿着朝鮮人民軍制服的志願軍對抗美軍」，「為此，中國領導人在瀋陽已集中了三個軍十二萬人的兵力」，希望「蘇聯能夠提供空軍掩護」<sup>⑭</sup>。5日，美軍與人民軍發生首次地面戰鬥的同一天，斯大林回電毛澤東並同意了中國的要求，承諾「我們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sup>⑮</sup>。換言之，中蘇就中國出兵朝鮮達成共識，即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就會出兵朝鮮，而蘇聯則負責提供空中掩護。

在斯大林答應提供空中掩護之後，中國就開始為出兵朝鮮做準備。7月7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由四個軍和三個炮兵師組成東北邊防軍，並命令該軍限8月5日前到達中朝邊境地區集結<sup>⑯</sup>。同時，周恩來派遣中國駐朝代辦柴成文向金日成通報，「中國政府已準備好提供任何朝鮮需要的戰爭物資」，並要求提供「朝鮮地圖和朝鮮人民軍軍服的樣品」<sup>⑰</sup>。

7月12日，毛澤東接見了人民軍副總參謀長李相朝，表示「如果朝鮮向中國政府呼籲請求，中國可以派軍隊入朝。中國為此準備了四個軍，共三十二萬人。如果我們派軍隊的話，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爆發，希望金日成於8月10日以前通報自己對於中國出兵的意見」<sup>⑱</sup>。這無疑顯示了中國在朝鮮戰爭初期派軍隊入朝的願望。對此時的毛澤東而言，美軍越過三八線，已不再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前提條件。

到了8月初，除朝鮮半島東南部以外，人民軍幾乎已佔領了整個朝鮮半島。然而，隨着來自美軍本土的大量部隊與武器陸續到達釜山，處於洛東江

戰線的美韓軍隊，在兵力與武器數量上開始超過人民軍。美韓軍隊藉機遏制住朝鮮的攻勢，並鞏固了釜山防禦陣地<sup>①</sup>。對此，中國領導人十分擔憂，認為中國必須及時出兵。8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們，甚至挑釁。因此，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須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sup>②</sup>。13至14日，高崗在東北邊防軍高級幹部會議上也強調了迅速出兵的必要性。他指出，「如果美國侵略者佔領了朝鮮，毫無疑問一定會準備力量，來進攻我們的東北與華北，進攻我們的祖國。那麼我們究竟是讓它打下朝鮮，讓它準備力量，增長氣燄，等它打到中國來的時候再去消滅它好呢？還是現在爭取主動，配合朝鮮人民軍，在國土以外，消滅敵人，保衛自己好呢？顯然地，在國土以外消滅敵人，是有利於我們，有利於我們的朋友，有利於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平民主的事業的」。毛澤東同意了高崗的意見<sup>③</sup>。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將希望盡快出兵朝鮮的意見通報了莫斯科。8月19日，毛澤東接見了蘇聯科學院院士尤金（П. Ф. Юдин），表示「如美國人決心要在朝鮮不惜一切代價取得勝利，那麼他們需要三十至四十個師。在這種情況下，朝鮮人就無法獨自對付，需要中國的援助。如果進行這種援助，就可以消滅美國的這三十至四十個師。而這個方案如能實現，將會推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當然，這對蘇聯和中國都有利」。第二天，蘇聯駐華大使羅申（Н. В. Рошин）就將這一觀點向斯大林匯報<sup>④</sup>。

朝鮮戰爭在洛東江戰線陷入僵局，朝鮮獨自取得勝利的可能性愈來愈渺茫。為此，中國加快了出兵朝鮮的準備。8月20日，毛澤東決定配備第二線兵力。26日，周恩來在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提到，最初組建邊防軍是為了「趕李承晚下海，一鼓而下，很快地解放全朝鮮，使得戰爭很快結束」，但在這種設想下是「備而不用」，現在朝鮮戰爭趨向長期化，中國出兵援朝「即將成為現實」<sup>⑤</sup>。

簡而言之，在人民軍佔優勢的戰爭初期，中國領導人就已經達成「盡快出兵幫助朝鮮取得迅速勝利」的共識。那麼，為甚麼此時北京希望盡早出兵呢？首先，朝鮮戰爭爆發和美國宣布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嚴重威脅了新中國政權的政治、經濟基礎<sup>⑥</sup>。許多中國人視這兩件事為中美之間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兆。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人們紛紛到銀行兌換現金，股票市場崩潰，居民開始搶購日用品（如大米、布匹、盤尼西林等）<sup>⑦</sup>。此外，大量謠言在全國範圍內迅速擴散，如「今年9月就要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麥克阿瑟將軍與台灣國民黨當局已就蔣介石重返大陸一問題獲致協議」、「日本軍隊將進攻滿洲，國民黨軍隊將進攻華南，美國軍隊將進攻華中」、「台灣國民黨當局正在採取措施，以引誘前投向北京方面的中國人回到國民黨方面」，等等<sup>⑧</sup>。甚至，意味着中共政權崩潰的「變天思想」和放棄對台軍事行動以避免與美國爆發軍事衝突的主張還相當普遍。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普遍不相信人民軍取得勝利的報導，一些中共的地方幹部也擔心美國即將轟炸中國，認為中國絕不是美國的對手<sup>⑨</sup>。可見，朝鮮戰爭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中共政權的政治和思想基礎。這些全國各地的反應，很快就報告給毛澤東。中國領導人認為這些情況嚴重威脅中共政權的安全，因此，7月23日，政

務院、最高人民法院經毛澤東的批准發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該指示宣布全面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並強調「積極領導人民堅決地肅清一切公開的與暗藏的反革命份子，迅速地建立與鞏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並順利地進行生產建設及各項必要的社會改革」<sup>⑳</sup>。

其次，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個資本主義國家參戰，為中國早期出兵提供了口實。如前所述，聯軍全面參戰之後的7月12日，毛澤東說，「如果朝鮮向中國政府呼籲請求，中國可以派軍隊入朝」。13日，金日成也向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Т. Ф. ШТЫКОВ)表示「由於美國等國家已站在李承晚一邊參加了戰爭，因此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等人民民主主義國家也就可以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sup>㉑</sup>。毛澤東和金日成的意見，表明聯軍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為社會主義陣營參戰提供了合法性。

為了鞏固中共政權、解決經濟問題，中國希望幫助朝鮮盡快取得勝利<sup>㉒</sup>。當朝鮮處於軍事上風時，出兵朝鮮並取得勝利就意味着「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利益」。此外，中國還能藉機擴大其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因此，盡早出兵幫助朝鮮取得速勝，對中國而言是「一石二鳥」。麥克阿瑟也承認，中共出兵的最佳時期為1950年7至8月<sup>㉓</sup>。如果中共在那時出兵朝鮮，戰爭形勢可能大為不同。

自戰爭爆發起，金日成曾多次表示希望中國派兵幫助朝鮮。7月19日，金日成向什特科夫說，「因美國空軍的轟炸，朝鮮人民軍的軍事行動實際上停止」。同時，金日成還通報了毛澤東希望盡快出兵的意願，並催請斯大林同意<sup>㉔</sup>。但是，斯大林一直保持沉默。因此，金日成於8月26日派秘書文日向什特科夫表示，「由於朝鮮人民軍目前的前線狀況非常困難」，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將會討論「提出中國同志派軍隊援助朝鮮」的問題，並打算向中國直接求助<sup>㉕</sup>。

至此，斯大林無法再置之不理。8月28日，斯大林回電金日成，「不要因為在與外國干涉者的鬥爭中沒有取得連續的勝利而不安，勝利有時也會伴隨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他安慰金日成：「現在朝鮮並不是孤立的，她擁有現在和將來都將援助她的盟友。」斯大林還說，「俄國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裝干涉時期的處境，比現在朝鮮同志的處境要困難得多」，並承諾「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向朝鮮空軍提供強擊機和殲擊機」。同時，斯大林鼓勵金日成，「聯共(布)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很快地被趕出朝鮮」。金日成在受到斯大林鼓舞後非常高興，稱「讓朝鮮勞動黨政治局成員了解這封信〔電報〕的內容是有用的」。然而，斯大林卻沒有提到中國或蘇聯出兵援朝的問題，僅僅是建議金日成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目前的困難<sup>㉖</sup>。這表示斯大林並不贊成金日成的請求。金日成在獲悉斯大林的態度後，直到9月底聯軍準備突破三八線時，再也沒有提過中國出兵的問題。

到7月中旬為止，美軍的失利以及投入到亞洲戰場的人數已經使西歐目瞪口呆。當時有六萬名東德軍警以及蘇聯二十七個師部署在東德，但只有十二個裝備老舊且協調糟糕的西歐國家的師團部署在西歐，並且沒有空軍。斯大林非常滿意朝鮮戰爭所造成的國際環境，因美軍節節敗退使其威信一落千丈、美國手足被縛於亞洲、西歐國家陷入了恐懼的漩渦<sup>㉗</sup>。8月27日，在給捷

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瓦爾德 (Klement Gottwald) 的口信中，斯大林強調「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而「美國在這裏〔遠東〕被纏住後就不能在短時間內着手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不定期拖延，這就為鞏固歐洲的社會主義爭取了時間」<sup>③⑥</sup>。毫無疑問，斯大林支持發起朝鮮戰爭的目標就是將美國的手腳盡可能長久纏住在亞洲。如果中國早期出兵，戰爭會很快結束，而這將會阻礙斯大林實現其戰略意圖。因此，向哥特瓦爾德致電的第二天（即28日），斯大林否定金日成關於中國盡快出兵朝鮮的建議是理所當然的。戰爭形勢的發展幾乎完全符合斯大林的世界整體安保戰略<sup>③⑦</sup>。

9月15日，聯軍成功登陸仁川，戰局迅速逆轉，中國領導人對出兵朝鮮的積極態度也開始動搖，轉為強調朝鮮獨立作戰、長期作戰和游擊戰。18日，周恩來召見羅申時表示，「由於沒有做長時間、大規模戰爭的準備，現在西方國家非常擔心蘇聯和中國會參加朝鮮的軍事衝突」。他指出「中國軍隊由南方向東北調動，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他還強調如果美國態度發生變化，「中國代表團準備參加聯合國會議」<sup>③⑧</sup>。同日，中國駐朝大使倪志亮向毛澤東呈交金日成關於準備長期作戰的書信。毛澤東在20日的回信中評價金日成的「長期作戰思想是正確的」，並勸其考慮「在堅持自力更生、長期奮鬥的總方針下如何保存主力便於各個殲滅敵人的問題」。此時，毛澤東特別強調了朝鮮要「自力更生」，而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問題，則一字不提。同日，毛澤東向周恩來與高崗作出特別指示：「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軍有出國的意圖。」<sup>③⑨</sup> 21日，劉少奇與羅申會談時也提及，國內對幫助朝鮮同志持反對意見的人更多了<sup>④①</sup>。22日，毛澤東在與尤金的談話中也主張，「不能排除美帝國主義者會試圖在不遭受嚴重打擊的範圍內妥協而擺脫當前不利情況的可能性」<sup>④②</sup>。可見，中共出兵態度轉為謹慎保守是上層協調一致後的正式決定，這證明中國希望通過與美國妥協解決朝鮮問題。與聯軍登陸仁川前的7至8月相比，中國在出兵朝鮮問題上的態度此時發生了明顯變化。中國的目標不再是殲滅和驅逐美軍，而是通過在聯合國的談判或「虛張聲勢」來阻止美軍突破三八線並同時保護朝鮮。

### 三 毛澤東向蘇聯和朝鮮通報中國「不出兵」的決定

9月28日，聯軍佔領漢城（今首爾）。同日，杜魯門允許聯軍越過三八線。次日，周恩來報告毛澤東，「美帝國主義已在公開表示將進軍三八線以北」<sup>④③</sup>。10月1日，麥克阿瑟向金日成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朝鮮無條件投降。在此情形下，斯大林與金日成一同向毛澤東要求中國軍隊出兵。至此，毛澤東必須決定是否出兵<sup>④④</sup>。

10月2日上午，毛澤東起草了給斯大林的出兵電報草稿，明確指出，出兵「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關於出兵的理由，他解釋道，如「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於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sup>④⑤</sup>。中國出兵不僅是為了保護朝鮮，更是為了東方的革命。

然而，在當天下午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與會者多數不贊成出兵。毛澤東只好擱置這份電報草稿<sup>45</sup>。當晚，毛澤東通過羅申通報斯大林，稱「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在出兵問題上必須謹慎行事」。顯然，毛澤東10月2日晚間向蘇聯通報的意見與其當日上午所擬而未發出的草稿內容完全不同。毛澤東明確中國不能出兵的理由如下：第一，中國軍隊不夠強大；第二，中美衝突會打破中國和平建設的計劃，並且可能將蘇聯拖入與美國的戰爭；第三，中共黨內存在強烈的反對意見<sup>46</sup>。

一些中國學者和中國官方文獻都聲稱，毛澤東的通報意見，並不表示中國不出兵，而只是「暫不出兵」，毛澤東出兵的決心從來沒有動搖過<sup>47</sup>。沈志華等人認為，毛澤東故意向斯大林通報含糊不清的意見，是為了爭取時間說服中共黨內反對出兵的意見，並向蘇聯爭取更有力的出兵條件<sup>48</sup>。相反，一些蘇聯學者認為毛澤東的通報拒絕了斯大林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要求，讓斯大林「感到震驚」並且「非常失望」<sup>49</sup>。

斯大林與羅申都認為，毛澤東的口頭通報表明中國拒絕出兵。羅申推測，由於「當前的國際形勢和朝鮮局勢惡化、英美集團陰謀通過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呼籲中國人採取克制的態度，以免陷入災難」，北京才改變了原來的立場<sup>50</sup>。10月8日，斯大林在給金日成的電報中也寫道，「10月1日我致電毛澤東，問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個中國師去朝鮮」，但「毛澤東拒絕了」<sup>51</sup>。毛澤東3日與金日成特使朴一禹的談話，也證實了中國不願出兵的立場。在談話中，毛澤東表示「中國可以盡全力向朝鮮提供任何幫助，但是不能派軍隊去」<sup>52</sup>。由此可見，毛澤東前一晚給斯大林的通報，應該是表明拒絕出兵。

10月3日凌晨，周恩來緊急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 (Kavalam M. Panikkar)，向美國發出警告，「美國軍隊正企圖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做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朝鮮事件應該和平解決」，而且「有關國家必須在聯合國內會商和平解決的辦法」<sup>53</sup>。周恩來的警告是為阻止聯軍越過三八線，從而避免中國出兵朝鮮<sup>54</sup>，因為此時北京的目標已經調整為以「虛張聲勢」或在聯合國談判來阻止聯軍越過三八線。換言之，毛澤東之前強烈的出兵意願和高漲的革命精神已褪色了很多。

## 四 斯大林的施壓與中國決定出兵

10月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討論出兵朝鮮問題，多數人仍然不贊成或存有疑慮。他們表示，「我們打了這麼多年仗，迫切需要醫治戰爭創傷；建國才一年，經濟十分困難；新解放區的土改和城市民主改革還沒有進行；國民黨留下的眾多土匪、特務、反革命份子沒有肅清，人民政權還沒有完全鞏固；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差和無制空、制海權等等」，並認為「不到萬不得已，最好不打這一仗」<sup>55</sup>。

然而，毛澤東自己依然在權衡是否出兵。10月2日晚，毛澤東讓周恩來派專機到西安接彭德懷到北京參加4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sup>56</sup>。除了要說服黨內佔大多數的反對意見，毛澤東還在考慮，如中國出兵，由誰擔任總司令

的問題。因當時彭德懷是唯一的人選，他的意見非常重要<sup>⑦</sup>。5日上午，在與毛澤東的第一次談話中，彭德懷先是反對中國出兵，他認為「蘇聯不出面而讓中國打頭陣，中國軍隊同朝鮮南方軍隊交手有獲勝把握，但同美軍較量則困難很大」。但在毛澤東的說服下，彭德懷最後同意。毛澤東讓彭德懷出任中國入朝軍隊的總司令，並在下午繼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達意見<sup>⑧</sup>。

10月5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仍然有出兵與不出兵兩種意見。彭德懷主張出兵，他說「如讓美軍擺在鴨綠江岸和台灣，它要發動侵略戰爭，隨時都可以找到藉口。如讓美國佔領了朝鮮半島，將來的問題更複雜，所以遲打不如早打」<sup>⑨</sup>。彭德懷發言後，毛澤東將中、蘇、朝三國比喻為三駕馬車，說「這輛車是三匹馬拉的，那兩匹馬執意向前跑，你又有甚麼辦法呢」，強調中國出兵難以避免。當日列席會議的楊尚昆回憶指出，時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代表的科瓦廖夫（И. В. Ковалев），在中方翻譯師哲的陪同下曾到過會場。隨後毛澤東離開會場到豐澤園與科瓦廖夫談了約二十分鐘。毛澤東回到會場後說：「你們看，果不其然，那兩匹馬一定要拉，我們不拉怎麼得了！」無疑，毛澤東是在暗示斯大林希望中國出兵。政治局隨即作出出兵朝鮮的決定，並由彭德懷掛帥<sup>⑩</sup>。時任蘇聯駐瀋陽總領事的列多夫斯基（А. М. Ледовский）稱：「在1950年10月5日下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向與會者展示了斯大林的電報並說『老頭子』（中國領導人有時稱斯大林為老頭子）認為我們應該出兵。因此，沒有人敢提出反對意見，然後政治局做出了出兵的決定。」<sup>⑪</sup>至少，楊尚昆的回憶和列多夫斯基的解釋可以證明，毛澤東利用斯大林的出兵壓力說服了黨內不同意見<sup>⑫</sup>。

10月5日斯大林發給毛澤東的電報中，強烈要求中國出兵。斯大林稱：第一，「美國目前還沒有為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做好準備」；第二，「日本無法為美國提供軍事援助」；第三，「美國將被迫在朝鮮問題上向中國讓步，因為蘇聯盟國是它的後盾」；第四，如果中國參加朝鮮戰爭，「美國最後將不僅被迫放棄台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並使其成為他們在遠東跳板的企圖」。一方面，斯大林威脅毛澤東「如果中國只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一場認真的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顯示出自己的力量，那麼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甚至「連台灣也得不到」。他還說「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讓它現在就打，而不要過幾年以後，到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將復活起來並成為美國的盟國」。另一方面，斯大林又鼓勵毛澤東，「如果中國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sup>⑬</sup>。

列多夫斯基主張，10月5日毛澤東向與會者展示的電報就是上文所提的電報。但是另一份俄國文獻顯示，上文所提的電報，直到6日晚上才被毛澤東收到<sup>⑭</sup>。為了明確斯大林在5日中國作出出兵決策中的角色，必須了解清楚他何時或如何給毛澤東發電報。

在現有解密文獻和對列多夫斯基訪談的基礎上，筆者做了如下推理。當時中國是否出兵是斯大林主要關注的問題。10月3日，在收到毛澤東對出兵持負面態度的電報後，斯大林立刻開始起草要求中國出兵的電報，並在5日發給北京。由於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正在討論出兵朝鮮問題，斯大林的電報必須

在中共做出最後決定前送達，加上當時分別代表蘇聯政府與聯共(布)中央的羅申和科瓦廖夫都在北京，因此，斯大林如此重要的電報不大可能在一天後(即6日)才被毛澤東收到。更有可能的是，科瓦廖夫作為兄弟黨的代表匆匆趕到政治局會議會場，向中共領導人遞交了斯大林的電報(楊尚昆與列多夫斯基的回憶證實了科瓦廖夫到場的事實，並且後者還證實了這封電報的遞交)。

那麼，為甚麼毛澤東決定幫助朝鮮呢？首先，美國和聯合國決定越過三八線已經成為事實。10月4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又稱「政治委員會」)批准八國決議草案，允許聯軍越過三八線<sup>⑤</sup>。5日，毛澤東提醒彭德懷「現在美軍已分路向三八線冒險，我們要盡快出兵，爭取主動」，強調了出兵的緊迫性<sup>⑥</sup>。其次，美國不理會周恩來3日警告聯軍不要越過三八線的聲明。在4日召開的英美聯席會議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指出「顯示遲疑與軟弱會招致很大風險」，並解釋道「部隊已經行動，計劃業已制訂，經過一段時間的重整後，聯軍司令部將會前進到朝鮮，現在停下來已經太晚了」，同時強調「我們不應該被中共的虛張聲勢嚇到」<sup>⑦</sup>。再次，斯大林向毛澤東施壓。如果中國繼續拒絕蘇聯的要求，中蘇關係的惡化將不可避免。由於中國在經濟建設和國家安全方面幾乎完全依靠蘇聯，新生的中共政權很難抵抗蘇聯的壓力<sup>⑧</sup>。最後，斯大林承諾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將會和中國共同與美國作戰。斯大林的承諾消除了毛澤東對蘇聯不提供空軍掩護和武器援助的擔憂。

但中國10月5日的出兵決定與蘇聯是否提供援助緊密相關。6日晚，毛澤東接見羅申時表示，「中國至少派九個師比較合適，而不是五六個師」，而且「關於軍隊的技術裝備，要完全依靠蘇聯的幫助」。此外，毛澤東還要求蘇聯空軍不僅「掩護上海、天津、北京、奉天(鞍山、撫順)等幾個最大的工業中心」，而且與中國軍隊共同「參加前線的戰鬥」。這相當於要求中蘇共同出兵<sup>⑨</sup>。

10月8日，周恩來帶着與蘇聯援助掛鈎的出兵和不出兵兩個方案前往黑海會見斯大林。同時，毛澤東命令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並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報了中國出兵的決定<sup>⑩</sup>。前一天，聯合國正式批准聯軍越過三八線。第二天，聯軍開始向朝鮮進發<sup>⑪</sup>。但在11日斯大林與周恩來的談話中，中國出兵問題再一次經歷了波折。

## 五 斯大林、周恩來會談與中國再次放棄出兵

10月11日，周恩來與林彪在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布爾加寧(Н. А. Бурганин)的陪同下，到達黑海與斯大林會談。會談從晚上7點持續到次日凌晨5點。

首先，周恩來詳細「介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要否出兵援朝問題的情況，說明中國的實際困難」，特別強調「只要蘇聯同意出動空軍給予空中掩護，中國就可以出兵援朝」。其次，周恩來「要求蘇聯援助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所需的軍事裝備，並向中國提供各種類型的武器與彈藥」。對此，斯大林答覆道，「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才能出動空軍

支援志願軍的作戰」，而且「用於裝備和培訓上述軍隊的時間至少需要六個月」。斯大林還拒絕了蘇聯空軍與中國地面部隊聯合作戰的要求。斯大林與周恩來共同認為，「如在一個月內不用相當數量的、裝備精良的部隊提供直接援助，那麼由於三八線以北的朝鮮軍隊無力支撐，朝鮮將被美國人佔領。因此，為朝鮮人提供的像樣的援軍只能在半年後，即朝鮮被美國人佔領，朝鮮已不再需要援軍的時候才能到位」<sup>②</sup>。

11日晚，在考慮上述因素以及「周恩來羅列的因中國參戰而給中國國內帶來的負面影響」之後，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毛澤東<sup>③</sup>：

我們一致決定：

- 1、儘管國際形勢有利，但中國軍隊因目前尚未做好準備，就不要越過朝鮮邊境，以免陷於不利局面；
- 2、如果部隊已經越過邊境，也不應深入靠近中國邊境一帶的山區；
- 3、一部分朝鮮軍隊應在平壤和元山以北的山區組織防禦，另一部分軍隊要轉入敵後打游擊；
- 4、把戰時應徵入伍的朝鮮人中的優秀份子及指揮員分批悄悄調入滿洲，在那裏把他們整編成朝鮮師團；
- 5、要盡快對平壤和北朝鮮山區以南的其他重要據點進行疏散。

在這封聯名電報的末尾，斯大林答應「中國同志所需的用於重新裝備中國軍隊的坦克、大炮和飛機，蘇聯將予以充分滿足」，並說「等待您的決定」<sup>④</sup>。因此，斯大林又將最終決定權交給了毛澤東。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是在沒有獲得毛澤東指示的情況下，當場與斯大林就出兵朝鮮達成了一致。這顯示當時中共領導人已經形成共識，即如果蘇聯不能馬上提供空中掩護和戰爭物資，中國就不會出兵。

根據與會的師哲的回憶，中蘇在人民軍撤退到滿洲（中國東北）的問題上發生了分歧。斯大林堅持「如果朝鮮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們白白犧牲，那就不如馬上告訴他們做有組織、有計劃的撤退，並答應他們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資和部分工作人員、幹部撤到中國東北，而把老弱病殘廢、傷病員大部分撤到蘇聯境內。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東北，是為了以後便於重新進入朝鮮。從中國東北要比從蘇聯進入朝鮮容易得多」。但是，林彪提出了疑問，他認為「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應讓他們留在朝鮮境內。那裏多山、有森林，他們可以進入山溝森林，進行長期游擊戰爭，而且可以轉戰於朝鮮南北各地，以待時機」。斯大林拒絕了林彪的意見，說「恐怕敵人不會允許游擊隊存在下去，而會很快把它們消滅掉的。既然不打算出兵，我們就得具體地籌劃，如何安置朝鮮同志和他們的武裝人員，保存實力和有生力量，以待時機」<sup>⑤</sup>。林彪擔心，如果人民軍撤到東北，東北以後將變成與美國作戰的主戰場。

10月12日下午3點半，羅申將斯大林一周恩來聯名電報轉交給毛澤東，毛澤東當場答覆「同意你們的決定」。七個小時後，毛澤東再次表示同意聯名電報的意見，他說：「我方軍隊還沒有出發，我已命令中國軍隊停止執行進入朝鮮的計劃。」<sup>⑥</sup>毛澤東第二次通知羅申，應該是與在京領導人商討後的結

果。隨後，毛澤東指示彭德懷與高崗，暫不實行出兵命令，讓他們馬上回北京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重新討論出兵朝鮮決定<sup>⑦</sup>。

10月12日，在收到毛澤東答覆後，斯大林很快通知金日成「中國同志再次拒絕出兵，因此，你們必須撤離朝鮮，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向北撤退」。斯大林指示金日成，「為組建新後備師而應徵入伍的朝鮮人要分批經中國邊境進入滿洲，在那裏組建師團（中國同志對此表示同意）」，以「朝鮮軍隊尚未使用的蘇聯武器來裝備在滿洲組建的朝鮮師團」。他還授權金日成：「對於所有蘇聯顧問，要麼派他們回蘇聯，要麼利用他們在滿洲組建新的朝鮮師團」，並且承諾「派所有在蘇聯學習過飛行的朝鮮人去執行飛行任務並在滿洲把他們整編成航空兵部隊，所用飛機由蘇聯提供」。什特科夫在第二天將該電報轉交給金日成<sup>⑧</sup>。在此情況下，斯大林計劃繼續利用駐中國東北的朝鮮師發起以東北為基地的反美戰爭。可見，不管中國是否出兵朝鮮，中國東北都勢必成為主要戰場。金日成向斯大林表示「我們將會執行這一計劃」<sup>⑨</sup>。最終，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同意中國將不派兵參戰。

毛澤東曾認為，對中國最不利的情況是：「如果我們出動幾個師，隨後又被敵軍趕回來，並由此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衝突，那麼我們和平建設的整個計劃將被全部打亂，國內許多人會表示不滿。」<sup>⑩</sup>中國領導人認識到如果中國出兵朝鮮而蘇聯又沒能提供空中掩護和武器，那麼最不利的情況將難以避免。毛澤東與周恩來以放棄出兵朝鮮來避免最不利的情況，對他們而言，鞏固中共政權遠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因此，毛澤東10月12日兩次通知斯大林中國不出兵的決定，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國出兵朝鮮原因的「安全威脅論」、「亞洲和世界革命論」以及「亞洲革命義務論」的基礎。

## 六 彭德懷的主張與中國最終決定派兵入朝

10月13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高崗和彭德懷均出席了該會議。會議改變了毛澤東前一天不出兵的決定，最終決定出兵朝鮮。因此，中國出兵的最終動機與當天的決策過程有重要聯繫；細緻並系統地分析決策過程非常關鍵。

在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剛結束後的10月13日晚上9點，毛澤東通知羅申，「中共中央再次討論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同志的最近一封電報和我的決定」之後，「我們的領導同志認為，我們應當幫助朝鮮人」<sup>⑪</sup>。晚上10點，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回覆斯大林一周恩來11日的聯名電報<sup>⑫</sup>：

周恩來同志：

- (一)與高崗、彭德懷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在第一時期可以專打偽軍，我軍對付偽軍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線以北大塊山區打開朝鮮的根據地，可以振奮朝鮮人民重組人民軍。兩個月後，蘇聯志願空軍就可以到達。六個月後可以收到蘇聯給我們的炮火及坦克裝備，訓練完

畢即可攻擊美軍。在第一時期，只要能殲滅幾個偽軍的師團，朝鮮局勢即可起一個對我們有利的變化。

(二)我們採取上述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

……

(五)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毛澤東

毛澤東通知周恩來中國已經決定出兵入朝，因為參戰對中國特別有利，其好處有不讓敵人推進至鴨綠江以阻止「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還有保護東北軍隊、電力等安全。他還解釋了第一階段中國軍隊的任務僅是與韓國軍隊作戰。

五個小時後，毛澤東又發了一封電報給周恩來，詳細解釋了軍事戰略，並包含了一份更為詳盡的行動藍圖。這封電報展現了毛澤東改變其10月12日決定以及中央政治局成員一致同意出兵朝鮮的原因。毛澤東的電文摘引如下<sup>③</sup>：

彭德懷同志在安東研究情況後，認為如果我軍能以一個軍進至平壤東北方面約二百公里之德川縣山嶽地區，而以其餘三個軍及三個炮兵師位於德川以北之熙川、前川、江界地區，則第一，可能使美偽軍有所顧慮而停止繼續前進，保持平壤元山線以北地區至少是山嶽地區不被敵佔。如此，則我軍可以不打仗，而爭取時間裝備訓練。第二，如元山平壤兩敵向北進攻德川等處山嶽地帶，則我軍可以必要兵力箝制平壤之敵而集中主力殲滅由元山方向來攻之偽軍，只要殲滅一二個或二三個完整的偽軍師，局勢就大為鬆動了。彭及高崗同志均認為打偽軍有把握，他們和我一樣，都認為參戰為必需和有利。

綜合考慮毛澤東的幾封電報，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10月13日，中央政治局激烈地討論了沒有蘇聯同步的空中掩護和武器支持下出兵的利弊，與會者最終達成共識：「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理由是，如果中國出兵朝鮮，「可能使美偽軍有所顧慮而停止繼續前進，保持平壤、元山線以北地區至少是山嶽地區不被敵佔」，「如此，則我軍可以不打仗，而爭取時間準備訓練，等候蘇聯空軍到來，然後再打」，「這樣做，即是將國防線由鴨綠江推進到德川、寧遠及其以南的線，而這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sup>④</sup>。中央政治局會議前夕，彭德懷在安東研究戰事後認為，中國出兵朝鮮將「使美偽軍有所顧慮而停止繼續前進」，這才是當日中國再次決定出兵朝鮮的關鍵因素<sup>⑤</sup>。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領導人並沒有任何先發制人的企圖，他們只準備了一份針對可能來自美韓軍隊進攻的防禦性計劃。10月14日晚上9點，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稱「在我軍裝備訓練完畢，空中和地上均對敵軍具有壓倒的優勢條件

之後，……在六個月以後再談攻擊問題」<sup>⑥</sup>。如果毛澤東的設想能夠實現，中國將不僅得以保持軍事優越性，而且在蘇聯提供空中掩護和武器後可以掌握戰爭主動權。由此，彭德懷提出，只要中國出兵，美韓軍隊就會在平壤—元山一線停止向北前進。該論斷獲得了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包括毛澤東的贊成。

不與美軍作戰而確保平壤—元山以北地區的軍事計劃，後來被毛澤東稱為「先組織防禦的計劃」。該計劃在志願軍出兵兩天後，即10月21日才做出更改。當日，毛澤東「決定放棄原定先組織防禦的計劃，改取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方針」，並命令彭德懷「殲滅偽軍三幾個師爭取出國第一個勝仗」<sup>⑦</sup>。

既然中國出兵朝鮮、美韓軍隊可能就地停止前進的推斷，才是10月13日決策的關鍵性因素，那麼蘇聯是否派遣空軍入朝便不再是中國出兵的前提條件。中國軍隊已經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中積累了豐富的山地作戰的經驗，因此他們有信心在多山的朝鮮北部地區可以擊敗韓國軍隊。14日，斯大林通知周恩來「蘇聯將只派空軍到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後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作戰」。但是，斯大林的通知並未影響中國出兵的決定<sup>⑧</sup>。

彭德懷的上述主張並非沒有根據。9月11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向麥克阿瑟下令，只有韓國軍隊可以「在與蘇聯接壤的朝鮮東北地區或者毗鄰滿洲的地區作戰」。28日，杜魯門再度確認這一原則<sup>⑨</sup>。次日，麥克阿瑟命令除韓國軍隊以外的聯軍不允許在「麥克阿瑟線」(自定州以西延伸，穿過軍隅里和寧遠，至咸興)以北採取軍事行動<sup>⑩</sup>。在聯軍越過三八線後，曾有廣泛傳言「這次戰爭的最終目的就是佔領平壤，佔領平壤之後，美軍就會離開朝鮮半島」<sup>⑪</sup>。

此外，9月27日，英國駐印度高級委員奈伊(Archibald Nye)向尼赫魯通報了美國的立場。他指出「美國並不希望將自己的部隊部署在與中國、與蘇聯接壤的地區」，「聯軍目前不打算越過北緯四十度線」，「到目前為止，朝鮮的佔領部隊主要由韓國軍隊組成」<sup>⑫</sup>。10月6日，英國外務大臣貝文(Ernest Bevin)向尼赫魯傳達了口信，「聯軍司令部方面並無意圖採取任何行動，足以被解釋成為對中國安全的威脅」，並且「除朝鮮〔韓國〕軍隊外，不擬將其他軍隊配置於鄰近中國邊境的地方」<sup>⑬</sup>。10日，貝文的口信通過潘尼迦轉述給中國外交部<sup>⑭</sup>。

10月17日，麥克阿瑟取消了這一限制。兩天後，他制定了新的一條非韓國人部隊前進的界限，即自西海岸的宣川起，通過古仁洞—平原—豐山到達東海岸的城津(今金策)。這條界限大部分在中朝邊界以南30至40英里。24日，麥克阿瑟進一步取消了所有對聯軍前進的限制<sup>⑮</sup>。

朝鮮迅速將聯軍的動向，包括非韓國人部隊前進界限的情報向中國通報。10月12日彭德懷前往北京參加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前，朴一禹抵達丹東，詳細地向彭德懷報告最新戰況，包括敵人的攻勢和朝鮮的防禦情況<sup>⑯</sup>。很可能彭德懷是在與朴一禹談話的基礎上，做出了美韓軍隊將會在平壤—元山一線停止向北前進的推斷。19日，朴一禹匆忙趕到丹東通知彭德懷，「最近兩天，戰局變得對我們更加不利了。前天(即17日)，麥克阿瑟下達命令，改變了原定美第8集團軍和第10軍在平壤—元山蜂腰部會合的計劃，命令這兩支部隊分東西兩線繼續向鴨綠江邊推進」，因此「你們要是再不出兵，問題就嚴

重了」<sup>①</sup>。上述事實證實了聯軍前進的界限在中國戰略中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朝鮮與中國幾乎實時地獲得了該界限的相關情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聯合國方面為阻止中國出兵朝鮮而採取的措施，卻促使中國決定出兵。

10月19日，志願軍正式入朝作戰。通過派兵入朝，中國可以獲得以下好處。第一，中國可避免「引火燒身」，讓滿洲地區不會淪為中美軍事衝突的主戰場。11日，斯大林要求將滿洲地區作為人民軍重編和休整的地方，並獲得了周恩來的同意，這勢必將戰爭帶到中國，並有可能進一步動搖新中國的政治基礎。因此，毛澤東在13日晚給周恩來的電報中強調，如果「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在同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彭德懷與高崗主張，「美國人會武裝國民黨並最終會進攻中國，到那時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又有甚麼用呢，中國不應該消極等待美帝國主義進攻中國」，強調至少應該保證朝鮮北部作為中美間的緩衝地帶<sup>②</sup>。第二，中國能夠保障鴨綠江上發電站的安全，從而確保經濟建設所需的電力。第三，中國可以履行對亞洲革命的義務，從而加強中蘇關係。但是，所有這些好處，都只是中國出兵朝鮮的必然結果，並不能作為其出兵朝鮮的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還是在於出兵對中國極其有利，正如毛澤東總結13日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的意見所說：中國「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

朝鮮戰爭期間，在毛澤東權衡出兵的過程中，保證至少不被打敗是最重要的因素。雖然毛澤東在決策出兵時多次提到革命擴張到亞洲和世界的好處，但一旦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相抵觸，毛澤東總是選擇前者而非後者。中國出兵援朝，是出於實際利益的考慮，即以最低的成本贏得最大的利益。

### 註釋

① Philip E. Mosely, "Soviet Policy and the W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 no. 2 (1952): 107-14; Alexander L. George, "American Policy-Making and the North Korean Aggression", *World Politics* 7, no. 2 (1955): 209-32.

②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114-15, 126.

③ J. H. Kalicki, *The Pattern of Sino-American Crises: Political-Military Interactions in the 1950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t.1; 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 *China under Threat: 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16-19; Gerald Segal, *Defending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92-99; Warren I. Cohen,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Friends: 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lect 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40s and the Korean War", *Diplomatic History* 11, no. 3 (1987): 283-89; Rosemary Foot, "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 *Diplomatic History* 15, no. 3 (1991): 412; Simei Qing,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in Korea: Assessment of Intentions in Time of Crisis", in *Northeast Asia and the Legacy of Harry S. Truman: Japan, China, and the Two Koreas*, ed. James I. Matray (Kirksville, MO: 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93-118.

- ④ 姚旭：《從鴨綠江到板門店：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21-22。
- ⑤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4, 201-209, 213-14. 陳兼的最新研究依然基本堅持以往觀點，即在1950年10月毛澤東始終堅持參戰，以此實現中國在戰爭中的「榮耀勝利」。參見Chen Jian, "Far Short of a 'Glorious Victory': Revisiting China's Changing Strategies to Manage the Korean War",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25, issue 1 (2018): 10-11。
- ⑥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第三版（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321-22。
- ⑦ Shen Zhihua, "China and the Dispatch of the Soviet Air Force: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Soviet-Korean Allia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3, no. 2 (2010): 211-30. 岡察洛夫等認為，在沒有蘇聯空軍掩護的情況下，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是為了保護中國自身的安全，即如果中國不出兵，蘇聯在未來中美發生戰爭時將不會幫助中國。參見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6-17. 沈志華的最新研究成果仍認為，毛澤東始終堅持出兵朝鮮是源於四個因素，即「對社會主義陣營承擔的國際主義責任，把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革命情結，保護新中國安全和主權的領袖意識，以及保持中蘇同盟戰略態勢的深層思考」。參見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增訂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頁228；《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頁319。
- ⑧ 參見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國際部：《金日成訪問蘇聯報告（1950年3月30日—1950年4月25日）》，轉引自Anatoly Torkunov, *The War in Korea 1950-1953: Its Origin, Bloodshed and Conclusion* (Tokyo: ICF Publishers, 2000), 50-51。
- ⑨ 參見“Intelligence Estimate Prepared by the Estimates Group, Office of Intelligenc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State” (25 June 1950),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Korea*, vol. VII (以下簡稱FRUS, Korea), ed. John P. Glenn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149-54; Harry S. Truman,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2,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56), 333-39。
- ⑩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7 June 195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mbassador at Large (Jessup)” (26 June 1950), in FRUS, Korea, 211; 179.
- ⑪ “Statement Issued by the President” (27 June 1950), in FRUS, Korea, 202-203.
- ⑫ 〈對杜魯門聲明的聲明〉（1950年6月2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524-25。
- ⑬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National Policy*, vol. III, *1950-1951, The Korean War*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Joint History, Office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1998), 47;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47-48.
- ⑭ 參見〈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2日），АПРФ（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ф.45, оп.1, д.331, л.75-77。
- ⑮ 〈斯大林致羅申電〉（1950年7月5日），РГАСПИ（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ф.558, оп.11, д.334, л.79。
- ⑯ 毛澤東：〈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批語〉（1950年7月7日、8日、1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頁159，註釋3。

- ⑰ 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36；〈金日成將軍 接見我駐朝代辦 柴軍武拜會朝鮮外交部長〉，《人民日報》，1950年7月14日，第1版；〈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15日），ЦАМОРФ（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ф.5, оп.918795, д.122, л.303-305。
- ⑱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20日），ЦАМОРФ, ф.5, оп.918795, д.122, л.352-55。
- ⑲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vol. III, 73-79;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48.
- ⑳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爭史》，上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頁97。
- ㉑ 〈高崗在瀋陽軍事會議上的講話〉（1950年8月13日），轉引自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爭史》，上卷，頁98-100；毛澤東：〈關於邊防軍務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戰準備給高崗的電報〉（1950年8月1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頁469。
- ㉒ Anatoly Torkunov, *The War in Korea 1950-1953*, 94-95.
- ㉓ 毛澤東：〈對配備第二線兵力報告的批語〉（1950年8月20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上卷，頁185；周恩來：〈充分準備，出手即勝〉（1950年8月26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43-50。
- ㉔ 關於朝鮮戰爭早期階段對中共政權經濟和政治基礎的影響，參見金東吉：〈朝鮮戰爭初期圍繞中國軍早期派兵的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的同牀異夢〉，《韓國與國際政治》，第30卷第2號（2014年6月），頁45-77。
- ㉕ 〈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上海市場情況〉，《內部參考》，第171期（1950年7月1日），頁1-2；〈上海工人、學生、教授對杜魯門聲明的反映〉、〈台匪擬利用朝鮮局勢離間我統一戰線〉，《內部參考》，第172期（1950年7月4日），頁1-2；〈津市工商界對目前時局的反映〉，《內部參考》，第173期（1950年7月5日），頁1-2。美國和香港已經禁止向中國大陸出口十一種戰略物資，包括石油、鋼鐵和橡膠等。因此，中國經濟陷入混亂狀態。參見〈由於目前局勢所引起的國際市場和我對外貿易的變化〉，《內部參考》，第174期（1950年7月7日），頁17-19；〈瀋陽各階層對朝鮮戰爭的反映〉，《內部參考》，第178期（1950年7月13日），頁40；〈美帝侵略朝鮮後首都市場動態〉，《內部參考》，第188期（1950年7月28日），頁97-98。
- ㉖ 〈天津市出現世界大戰謠言津市民對朝鮮戰事有疑問〉，《內部參考》，第171期，頁3；〈台匪擬利用朝鮮局勢離間我統一戰線〉，頁12。
- ㉗ 〈津市商人議論朝鮮戰事將有引起第三次大戰的可能〉，《內部參考》，第175期（1950年7月10日），頁24-25；〈無錫幹部工人學生對目前時局的反映〉，《內部參考》，第176期（1950年7月11日），頁31-32。當時關於「美國試圖逮捕毛澤東，海南島已經落入美國和蔣介石手中，林彪已經犧牲」的傳言散布很廣，參見〈瀋陽各階層對和平簽名運動的反映及反動份子的謠言〉，《內部參考》，第178期，頁39-40；〈熱河、錦州等地幹部群眾對朝鮮戰事的反映〉，《內部參考》，第184期（1950年7月22日），頁79-80。
- ㉘ 〈政務院、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1950年7月2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358。
- ㉙ 〈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20日），л.352-55；〈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7月15日），л.303-305。
- ㉚ 陳兼認為，毛澤東試圖在8月底、9月初出兵朝鮮以便加速朝鮮取得勝利，或至少阻止反動勢力的增長並加速中國聲稱擁有領導權的亞洲革命的擴展。參見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154, 158-59。
- ㉛ "Substance of Statements Made at Wake Island Conference on 15 October 1950", in *FRUS, Korea*, 953.

- ⑳ 〈什特科夫致外交部電：朝鮮政府請求提供國際空軍援助〉(1950年8月19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102, оп.6, п. 21, д.48, л.109-69。
- ㉑ 什特科夫在報告中也指出：「金日成對憑藉自身力量贏得戰爭勝利完全失去了信心，因而多次試圖徵得蘇聯使館的同意，以便請求中國軍隊來幫助朝鮮。」參見〈什特科夫致維辛斯基電〉(1950年8月28日)，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7, л.666-69。
- ㉒ 參見〈斯大林致金日成電〉(1950年8月28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5-6；〈什特科夫致斯大林電〉(1950年8月29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12-13。
- ㉓ 參見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69), 435-40;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54。
- ㉔ 〈斯大林致哥特瓦爾德電〉(1950年8月27日)，РГАСПИ, ф.11, оп.11, д.62, л.71-72。英譯參見“Letter from Filipov (Stalin) to Soviet Ambassador in Prague, Conveying Message to CSSR Leader Klement Gottwald” (27 August 1950), in Donggil Kim and William Stueck, “Did Stalin Lure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Korean War? New Evidence on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e-Dossier*, no. 1 (June 2008): 4-6。
- ㉕ Donggil Kim, “Stalin’s Korean U-Turn: The USSR’s Evolving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24, no. 1 (2011): 89-114；金東吉：〈朝鮮戰爭初期圍繞中國軍早期派兵的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的同牀異夢〉，頁45-77。
- ㉖ 參見〈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9月18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23-26。9月20日，斯大林回電，「最近由於〔美國〕空降兵在仁川地區登陸，朝鮮的軍事形勢變得複雜，使得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變得更加困難」，但同時承諾蘇聯代表將會在聯合國大會堅決捍衛中蘇關於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參見〈葛羅米柯致羅申電〉(1950年9月20日)，РЦХИДН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研究中心)，ф.17, оп.162, д.44, л.116-18。
- ㉗ 9月18日，高崗致中國駐朝大使倪志亮並中央軍委電報說，「我軍進入朝鮮境內以後，鴨綠江橋可能被炸，部隊龐大的供應將依靠公路汽車為主。我們對朝鮮公路、鐵路情況了解甚差，請向朝方要一詳細的公路路線圖並註明各地橋樑寬度、水深，以便準備和籌劃器材」。對此毛澤東提出，「這種電報打得很不好，去一電制止」。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194-96；《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11。
- ㉘ 〈羅申致斯大林電：劉少奇談中國各界對朝鮮戰爭的看法〉(1950年9月22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1, л.133-35。
- ㉙ 毛澤東強調說，「美國應該明白，中國加入聯合國並與美國建交之前，會公開反對美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行為」。這意味着如果美國同意中國加入聯合國並決定與中國建交的話，中國不會反對美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參見Anatoly Torkunov, *The War in Korea 1950-1953*, 101-102。
- ㉚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Mi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26 September 1950), in *FRUS, Korea*, 781-82；〈周恩來對朝鮮戰況的報告〉(1950年9月28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111。
- ㉛ 〈斯大林發給毛澤東的電文〉(1950年10月1日)，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97-9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00。
- ㉜ 毛澤東：〈關於決定派軍隊入朝作戰給斯大林的電報〉(1950年10月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39。
- ㉝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03。但是，陳兼和岡察洛夫等斷定毛澤東10月2日起草的電報發給了斯大林，而且陳兼認為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是為了完成「中國革命」並在亞洲擴張共產主義運動。參見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179-80;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176-79。

④⑤⑥⑦ 〈毛澤東致斯大林口信〉(1950年10月3日)·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05-106; 106; 105-106。

④⑧ 《毛澤東年譜》及沈志華將電報中的俄文原句“войска не выдвигать ктивно, готовить силы”翻譯為「暫不出兵，同時準備力量」。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01；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頁283-85。

④⑨ Shen Zhihua and Li Danhui, *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9-40。

④⑩ Anatoly Torkunov, *The War in Korea 1950-1953*, 103-105; Alexander 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ember 16-October 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History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letin*, vol. 6/7 (winter 1995): 100。

④⑪ 〈斯大林致金日成電〉(1950年10月8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47, л.65-66。

④⑫ 〈蘇軍駐平壤代表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7日)·ЦАМО РФ, ф.5, оп.918795, д.121, л.705-70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84；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戰爭史》，上卷，頁167。

④⑬ 周恩來：〈美軍如越過三八線，我們要管〉(1950年10月3日)，載《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頁66-69。印度政府向英國轉達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即「如果只是南朝鮮人越過三八線，中國干預不會發生」，但是在中文文獻中並未發現該記錄。參見“The Chargé in the United Kingdom (Holm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3 October 1950), in *FRUS, Korea*, 839。

④⑭ 參見 Hao Yufan and Zhai Zhihai,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1 (March 1990), 94-115。但是陳兼與斯圖克認為周恩來的警告是用來爭取寶貴時間以完成最後的軍事準備，並用來為中國出兵朝鮮在國內外為自己作辯護。參見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180-81;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99。

④⑮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04；《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118。

④⑯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03。事實上，彭德懷對北京召開的會議一無所知。他原以為這次會議將會討論西北地區的發展，因此他開會前帶上了有關的經濟發展圖標。參見《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彭德懷傳》(北京：中國當代出版社，1993)，頁401-403。

④⑰ 根據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王亞志的回憶，解放軍內只有六位將軍可以指揮多軍種聯合作戰，即彭德懷、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粟裕與陳賡。在他們之中，林彪、粟裕和徐向前因病臥牀，劉伯承被安排建立軍事科學院，陳賡被派往越南協助胡志明。因此，唯一可用的人只有彭德懷。參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頁291。

④⑱ 參見章百家：〈「抗美援朝」與「援越抗美」——中國如何應對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3期，頁10。1995年7月20日，前國家主席楊尚昆在接受彭德懷傳記組訪問時，曾提到這一事實。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119，註釋2。

④⑲ 《彭德懷傳》，頁402-403。

④⑳ 楊尚昆確認科瓦廖夫確實在10月5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期間出現過。參見蘇偉民：〈楊尚昆談抗美援朝戰爭〉，《百年潮》，2009年第4期，頁12。

㉑ 在與筆者的談話中，列多夫斯基曾說高崗通知他，科瓦廖夫曾去過10月5日的政治局會議。參見筆者對列多夫斯基的訪談，2004年10月19日；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СССР, США, Китай и 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Кто Развязал Корейскую Войну? Мифы и Факты Взгляд из Москвы*, unpublished manuscript, 183。

- ⑥② 有學者認為，10月5日，「彭德懷在會議上支持毛的出兵計劃導致黨內氣氛完全變化」。參見Chen Jian, "Far Short of a 'Glorious Victory'", 11。
- ⑥③ 〈斯大林致毛澤東電〉(1950年10月5日)，載沈志華主編：《朝鮮俄國檔案複印件》，第七卷，未刊，頁909-13；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No. 5, 105-106。
- ⑥④ 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СССР, США, Китай и 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Кто Развязал Корейскую Войну?*, 183；〈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7日)，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26-28。
- ⑥⑤ 關於英國、澳大利亞、巴西、古巴、荷蘭、挪威、巴基斯坦、菲律賓等八國9月28日提交的關於朝鮮問題聯合草案，參見"The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at the United Nations (Austi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9 September 1950), in *FRUS, Korea*, 826-28。10月4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案與10月7日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文本實際上完全相同，參見"Editorial Note", in *FRUS, Korea*, 873-74。
- ⑥⑥⑥⑦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05；213-14；217-18。
- ⑥⑦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John M. All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4 October 1950), in *FRUS, Korea*, 868-69。
- ⑥⑧ А. М. Ледовский, *СССР, США, Китай и 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Кто Развязал Корейскую Войну?*, 183。
- ⑥⑨ 〈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7日)，л.126-28。
- ⑦⑩ 毛澤東：〈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撤出朝鮮問題〉(1958年1月2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軍事文稿》，中卷，頁372-74；《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121；毛澤東：〈關於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關於派出志願軍入朝作戰問題給金日成的電報〉(1950年10月8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43-44、545；〈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8日)，ф.558, оп.11, д.334, л.132。
- ⑦⑪ "Resolution 376(V), Adop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ctober 7, 1950", in *FRUS, Korea*, 904-906。
- ⑦⑫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冊，頁85；〈斯大林—周恩來聯名致毛澤東電〉(1950年10月11日)，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34-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921。
- ⑦⑬⑭ 〈斯大林—周恩來聯名致毛澤東電〉(1950年10月11日)，л.135。
- ⑦⑮ 師哲回憶，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497。
- ⑦⑯ 〈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12日)，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35；〈毛澤東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12日)，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41。中文文獻包括《毛澤東年譜(1949-1976)》從未提及毛澤東曾兩次同意斯大林—周恩來聯名電報。
- ⑦⑰ 毛澤東：〈關於十三兵團仍在原地訓練給彭德懷等的電報〉(1950年10月12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52。10月12日晚上，代理總參謀長聶榮臻給彭德懷打電話，通知他「原定方案有變化！主席命你和高崗明日回京面商」。參見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442。
- ⑦⑱ 參見〈斯大林致瓦西里耶夫斯基與什特科夫電〉(1950年10月12日)，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42-44。10月9日，金日成請求斯大林同意從朝鮮在蘇學習的學生中培訓200至300名飛行員，並從蘇籍朝鮮人中培訓1,000名坦克車司機、2,000名飛行員、500名無線電操作員以及500名工程師。參見〈金日成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9日)，АПРФ, ф.45, оп.11, д.347, л.72-73。
- ⑦⑲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電〉(1950年10月14日)，АПРФ, ф.45, оп.1, д.335, л.3。
- ⑦⑳ 〈羅申致斯大林電〉(1950年10月13日)，РГАСПИ, ф.558, оп.11, д.334, л.145。

- ② 毛澤東：〈中國人民志願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1950年10月1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03-104。引文中的粗體為筆者標註，下同。
- ③ 毛澤東：〈關於朝鮮情況和我軍入朝參戰意見給周恩來的電報〉（1950年10月14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58-59。10月11日，彭德懷從瀋陽抵達丹東。12日晚上，聶榮臻給彭德懷打電話，通知他「蘇聯空軍暫時無法出動配合中國志願軍入朝作戰」。因此，在離開丹東赴北京前，彭德懷已經知道蘇聯空軍不會採取行動。參見《彭德懷年譜》，頁442。
- ④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86-87；毛澤東：〈關於朝鮮情況和我軍入朝參戰意見給周恩來的電報〉，頁558-59。10月14日晚上9點，毛澤東給周恩來發了封電報，強調「在六個月內，如敵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則我軍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頁213。如果美韓軍隊同時發動進攻，毛澤東計劃避開美軍，集中主力與韓軍作戰。參見〈毛澤東關於志願軍入朝作戰的方針和部署給周恩來的電報〉（1950年10月14日），載〈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動朝鮮作戰的一組文電〉，《黨的文獻》，2000年第5期，頁8。
- ⑤ 沈志華認為，中國10月13日決定出兵的原因是毛澤東堅持出兵並說服彭德懷和其他與會者。參見沈志華：《最後的「天朝」》，增訂版，頁224。
- ⑥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頁87；毛澤東：〈關於志願軍先頭部隊出動時間給彭德懷、高崗等的電報〉（1950年10月17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頁567。
- ⑦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o the President” (9 September 1950);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Mi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26 September 1950), in *FRUS, Korea*, 712-21; 781-82.
- ⑧ Roy E.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June-November 1950*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t. of the Army, 1992), 670.
- ⑨ Roy E.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647；首爾新聞社編：《駐韓美軍30年（1945-1978年）》（首爾：杏林出版社，1979），頁197-98。
- ⑩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8 September 1950), in *FRUS, Korea*, 808-10.
- ⑪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6 October 1950), [Annex 3] Tab C, in *FRUS, Korea*, 896.
- ⑫ 〈印度大使館轉來英國外交部長貝文致周總理電文〉（1950年10月1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0009-01，頁24-25；周恩來：〈抗美援朝，保衛和平〉（1950年10月24日），載《周恩來軍事文選》，第四卷，頁74。
- ⑬ James F. Schnabel and Robert J. Watson, *History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vol. III, 105, 117-18; Roy E. 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 670.
- ⑭ 朴一禹給彭德懷的關於聯軍最新行動的報告通過毛澤東的電報轉報給了周恩來。參見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頁430；毛澤東：〈關於朝鮮情況和我軍入朝參戰意見給周恩來的電報〉，頁558-59。
- ⑮ 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頁436。
- ⑯ 參見毛澤東：〈中國人民志願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頁103；Anatoly Torkunov, “Consul General Ledovsky Cable to Moscow (October 25, 1950)”, in *The War in Korea 1950-1953*, 108-109；筆者對列多夫斯基的訪談，2004年10月19日。